



三足乌文丛



民族神话学论集

王孝廉_二著

学苑出版社

岭云关雪

三足乌文丛·刘锡诚主编

岭云关雪

——民族神话学论集

王孝廉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王孝廉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1

(三足乌文丛/刘锡诚主编)

ISBN 7-5077-1091-2

I. 岭… II. 王… III. 神话-研究-中国 IV. 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648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市王史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 13.5 印张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27.50 元

整合

——《三足乌文丛》总序

刘锡诚

不同世界观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都曾有人表达过这样一种非常接近的思想：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民族中，都存在着两种文化。如果采用一种简化的公式来表达，我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这两种文化是同源而异流的，即源于本土的原始文化，在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出现了被称为“劳心者”的思想家后，便逐渐创建了上层文化，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社会成员——民众，则以传承的方式承袭着和发展着本土的原始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两者都是传统文化，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渗透。

具体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也是如此，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虽然经历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两次大的文化转型，儒、道、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到了清末，大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上层文化，已僵化到了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束缚自由思想和扼杀创新意识的地步。1840年以后，在西方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影响下，一批代表维新思潮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局限性，涌起了一个“西学东渐”的浪潮，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于是也大行其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背叛了养育过他们的上层文化，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他们的旗帜上写的是：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



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文。同时，他们当中有的人执着于借鉴西方文化，有的人则热衷于提倡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就是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昭示的，实际上是以民主和科学来整合中国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鲁迅说：民间文化的特点是“刚健清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七）“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杨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难读了。”（《致姚克信》1934年2月20日）文学如此，文化莫不如此。当一种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时候，摄取民间文化或外国文化而获得一个新的转变，也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五四”先锋们开启的中国文化整合方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继承。虽经几代人的呼吁和努力，下层文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拯救和认同，但应当坦率地承认，进展并不都是很顺利的，道路也不是笔直的；即使有一些人在做，也往往是孤立

无援，得不到社会重视甚至承认。近邻印度人的《摩珂婆罗多》的出版仪式，曾列为当年国会的大事；芬兰人的《卡列瓦拉》的编纂成书，曾被尊为民族独立的象征。在我们，《格萨尔王传》何曾得到过这样的荣耀？恐怕连许多文化史家文学史家也是没有接触过的。近五十年来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上古文化史，使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成为不争的结论。但考察中国文化研究界，似乎并没有从考古学的发现中得到多少启发，仍在固守着先祖们的家业。远的说，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结果；近的说，中国由于多民族的构成，其文化（有的民族也有上层与下层之分），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而下层文化的发展，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层文化的影响，民族之间也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或强或弱的文化（包括外来文化）交融，不论发生怎样的影响和变化，从总体来说，下层（民间）文化虽然有某些惰性，但它从来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较为独立的品格和体系。多少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抛开或忽略下层文化，特别是多民族的下层文化及其交流与融合，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去谈论和研究中国文化史，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

对下层（民间）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薄弱或缺席，所导致的，不仅是现阶段文化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与“五四”时代比较起来，在指导思想上甚至还呈现了某种倒退的趋势。这无疑应引起重视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化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化。而一个悠远稳定而不断创新的文化传统，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不断前进的内驱力。“五四”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21世纪，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整合与研究的圭臬。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对搜集和研究下层



(民间)文化上,给予更多的注意。流布于民间的下层文化,对于我们当世的知识界来说,所知者甚少,而未知者则甚众。而要以民主与科学为指针整合中华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文献资料和书斋研究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首当其冲的还是要深入到民间去,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去采集,去观察,去调查,去研究。这就急需吸取新兴的人文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1994年笔者为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俗文丛》20种所写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实证”的方法,仍然没有失去其价值。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为此,才有了这套《三足鸟文丛》的编辑与出世。

参加文丛的作者,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切入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也不尽一样,每本著作的风格肯定是各不相类的,但我们所希望的是:

一、尽可能遵循实证的原则,从丰富的材料(特别是田野资料)中推演出应有的结论,切忌流于空论玄学;

二、行文要明白顺畅、深入浅出,尽量避免诘屈聱牙、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故做艰深的文风,以便能无障碍地与读者交流。

三、配有一定数量的照片或图画。对于某些学科来说,文字的叙述有时不能代替图画的展示,前人或实景的图画(最佳是老照片),

能起到文字无法起到的实证效果。

下面的这段话就是《三足鸟文丛》的“出版献辞”：

“三足鸟”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鸟。化身于光明，象征着生命。

王充《论衡·说日》曰：“日中有三足鸟。”《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坠其羽翼。”留下的一鸟系三足，传为日精，或驾日车者，为中国先民所崇拜。

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承，如“日精”之生生不息，“日车”之滚滚向前。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本“文丛”名为“三足鸟文丛”，正是取意于此。愿三足鸟驾太阳之车，永向光明。

2001年2月10日于北京

自序

——我研究神话学的历程

王孝廉

(一)

1970年8月20日，我从台北到了东京。我原先是因为徐复观老师和清水董三先生的推荐而进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科的，但是却因为我来日本时所持的是早稻田大学的入学许可而不能顺利地进东大读书，于是我在东京既是早稻田大学的日语学生，又是东大中国哲学科宇野精一教授个人的特别听讲生。事实上在早稻田大学刚办完了入学手续，在东大也只上过宇野精一先生的两次“墨子”以后，我就离开东京而到广岛大学去了。

到广岛大学是因为池田末利先生的关系。有一次，他到东京去开日本学术会议，我和陈文华兄去本乡会馆看他，当时他那很流利的中国话使我觉得很亲切。另外，使我感动的是他的豪迈气息与过人的酒量。他告诉我广岛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是由他和研究中国神话的御手洗胜先生主持古代中世思想史，另外一位研究朱子学的友枝龙太郎先生主持近代思想史。于是，我决定到广岛大学跟随池田先生和御手洗胜先生做古代宗教和神话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池田先生第二次上东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他把我带到了广岛。记得那是十月，一个下着大雨的黄昏。



在广岛大学，池田先生讲授金文、《左传》、《仪礼》和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制度，御手洗先生讲授《诗经》、《国语》和《古代神话》，友枝先生讲授《朱子》和《陆象山》。当时广岛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方面是继承乾嘉学者以文字、声韵学考证中国的古典文献，同时又以西方的理论方法来看古代的中国。这也是日本传统汉学在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寻找出路的一种汉学维新的研究风气。

我的神话研究的入门书是池田先生指定的松村武雄的《神话学原论》和《古史辨》。

我阅读了几乎是全部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神话的论文，从白岛库吉、津田左右吉、出石诚彦，到东京、京都两大汉学中心的学者，再到当时的森安太郎和御手洗胜；并写了一篇《日本学者的中国神话研究》，发表在台北的《大陆杂志》（45卷1期，1973）上，当时受到一些学者和师友们的重视和好评。只有两个老师例外。

池田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后，只笑了笑，说了一句：“还早呢！”

同年，我翻译的森安太郎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一书出版（台北地平线出版，1973）。池田先生接过书后，随便翻了翻，也是一句话：“你整天翻译别人的书，什么时候能写你自己的东西呀？”

徐复观先生对我能在池田先生门下读书，

非常高兴。那时，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70年1月20日的信上说：“你能在池田先生的门下，实在是很幸运，人生治学，以能否遇到良师益友为最大机缘，万万不可轻易放过，……我在日本时，若遇到这样有学问而又这样亲切的先生，便不会进士官学校，学问也早就成名了。”

但是，徐先生一直反对我研究神话。他读了我的论文和我翻译的书，来信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翻译这种东西，研究神话，一定要在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去做这种工作。日本研究中国神话的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都缺乏基本常识，也没有接触到西方近代在这一方面所摸索出来的若干理论，而只靠胡猜乱想，自我陶醉。我没想到他们水准这样低。而你一去便投入这一混乱中，真要害你一生的。你应该好好读《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等基本典籍，再看卡西勒的《神话》，勉强才够资格研究中国的神话。（1974. 6. 24）

我的硕士论文是御手洗胜先生指导的，题目是《从古史到神话——以古史辨为中心的中国神话研究》。徐先生看了我的纲要和部分原稿后，依然不赞成。他在信上说：

由说文上推金文，由金文上推甲骨文，是研究中国神话的必需工具，你应受这种训练。我看你的论文，只使我抱愧，太没让你学到一点什么，你既不记得原始文献，也缺乏基本理解能力。（1974. 4. 23）

1981年，徐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还是说：“我始终不



赞成你继续弄中国神话的东西，许多人做这类工作，已走火入魔了。”（1981. 11. 11）1982年4月1日，老师去世。76岁。

池田先生在我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退休离开广岛大学，到他母校大东文化大学任教，后任大东文化大学校长。2000年11月9日，老师去世。90岁。

（二）

在神话研究上，30年如一日，直到今天仍在指导我的，是御手洗胜先生。御手洗先生研究中国神话的动机，是由于他当时目睹日本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天皇的盲目信仰之刺激而引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民族集体意识的神话信仰。他上大学读的是汉文系，他觉得要了解中国民族思想的根源，必须从中国的神话开始。1947年，他在广岛大学东洋史学教研室做研究生，跟随杉本直治郎教授做南方史的民族学研究。当时池田先生在东洋伦理学科讲授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制度史，鼓励御手洗先生研究中国神话，并且借给他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这本书是御手洗先生研究中国神话的开始。

在研究方法上，他师承的是池田先生的老师加藤常贤先生，以文字、声韵、考古为主。这也是当年古史辨学者们所使用的治学方法。

御手洗先生早期发表的《古代中国的太阳神话》(1945. 10), 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昆仑思想的展开》(1962. 3) 和《昆仑传承与永劫回归》(1962. 10), 已经可以看出 M. Eliade 的《圣与俗》、《永远回归》等书的影响。在广岛大学期间, 我读完了 M. Eliade 著作的所有日译本, 书都是御手洗先生的。1982 年我写的《试论中国仙乡传说的一些问题》, 其中昆仑的部分, 受御手洗先生的影响极深。后来, 我研究了杜而未、苏雪林、顾颉刚及诸多学者关于昆仑的论述, 加上近年来我所做的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 直到去年, 我才在《绝地天通神话——昆仑神话主题解说》(1999) 一文中, 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看法, 即昆仑的原始源于古代羌族的圣岳信仰。

御手洗先生后期的研究, 是全面地考证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神话。黄帝、颛顼、尧、舜、禹五帝传说, 及伏羲、神农、祝融等各个古代氏族的始祖神话。其中以黄帝的研究着力最深, 最能代表先生的独特见解。1983 年 7 月, 正在校稿的先生突发脑出血倒下入院。1984 年 3 月, 集先生中国神话研究大成的《古代中国诸神》出版(创文社)。1988 年, 先生自广岛大学退休, 后来转任岐阜大学。六年前又到龄退休。先生出生于 1924 年, 今年 76 岁。

御手洗先生在广岛大学任教 30 多年。跟他做神话研究的, 却只有两个台湾来的研究生。除了作者外, 另一个是学弟吴继文。吴君才华出众, 智慧过人, 可惜的是, 他在御手洗先生门下读完了硕士, 写了一篇很优秀的《玄鸟降临——殷民族始祖传说研究》论文, 就回台湾去了, 并离开了神话。 he 现在是著名的作家。我的其他日本同学, 或治《左传》、《国语》; 或治《列女传》、《抱朴子》等, 都可称为专家, 但对御手洗老师研究了一生的中国神话, 却无人问津。

先生 1988 年退休时, 我和吴继文编了一本《御手洗胜博士退



官纪念论文集》，也就是至今仍然再版的《神与神话》（台北经联，1988）。那是联合中日两国、海峡两岸的神话学者共同执笔完成的一本专门的学术著作。在神话学界说来，不论是在日本或是中国，这样的结合都是第一次。执笔的日本学者都是御手洗胜先生多年的朋友，也都是日本治中国神话学的各方俊彦。参加撰文的中国学者有：杨宽、袁珂、汪宁生、宋兆麟、何新、萧兵、李子贤、谢选骏。

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是我大学时代读的第一本神话书。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是我和我的老师御手洗先生研究中国神话的入门书。因为前面说的编印一本论文集的机缘，这些学者，除了谢选骏教授以外，都成了时常见面或联系不断的老朋友。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研究和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我启发很大，助益很多。

（三）

以《古史辨》为中心的中国神话研究，始于顾颉刚的“疑古”。疑古学派学者的目的是推倒中国的古代史，但是并没有把自己要推倒的古史安置定位。到了杨宽，才把这些被推倒的古史人物，还原到神话的位置上。杨宽已经利用了出土的卜辞资料，而他论述的中心，依然是古文献资料的再检讨再考证，特别是透过

文字学的字音的互通关系来建立古史神话人物的系谱传承。到了王国维提出以地下资料印证纸上资料的“双重论证”的研究方法，古史神话的研究才走出了乾嘉考据训诂的传统，从而开启了非文献史学的研究。

日本的学者，加藤常贤、贝冢茂树、池田末利、御手洗胜、白川静、森安太郎等许多学者，在中国神话的研究方法上，都曾经是或一直是以文字学的立场纵横驰骋于古文献之间，从文字的原初音义的解明去构架中国神话的秩序。

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师出有名、无往不利。经过音义的互通、假借、转注而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流弊也大。经常像匹野马，跑错了方向和目的地，产生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结论。比如章太炎清末在东京讲古文字学，他解释《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时候，不管历来“洲”字的解释，如《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正字通》：“洲，说文本作州，水中可居者曰州、后人加水以别州县字”；《释名》释水：“洲，聚也，人及鸟兽所聚息之处也”……其实这些“水中可居称为洲”的解释，已经是足以解释在河之洲的关关雎鸠了，可见他却不辞辛劳地从《说文》：“𩇐，马之白州者也，从马燕声”，转到《尔雅》释畜：“州，窍也”，再转到《广雅》释畜：“尻，州、臀也”，于是此在河之“洲”就成了“窍”、“尻”、“臀”而至于“女阴”的结论了，“乐而不淫”的《诗经》“关关雎鸠”，经过章氏的七转八转，就变成了“雎鸠淫于河中”的结论了。这样的文字学上的训诂考据，后来被闻一多用来解释他的神话研究，就是有名的《伏羲考》那篇至今影响极大的论文。

晚年的池田先生，曾对他师承加藤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有过深切的反省。他说：



中国文字有其字形、字音（声、韵）、字义的三大要素。这是世界上其他文字所没有的最大特色。经由文字学的分析追索，可以把握到某种程度的社会事实。但是用并不明确的古代字音，过分容易地用假借和互通的方法去看问题，是危险而应该反省和自戒的。（1981）

在中国神话研究上，有一些学者是从西方的神话学理论去解释中国的古代神话。出石诚彦、松本信广、森三树三郎等学者，他们太过拘泥于西方神话的定义和理论，所以常提出“中国是神话的不毛之地”或“中国没有神话”等主张，把中国的神话归类于西方的传说、故事的范围里面。近30年来，许多文化人类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神话，多半是从中国、日本、朝鲜到东南亚，从大陆经太平洋诸岛到非洲，追踪和比较各地域神话上的近似性。江上波夫、三品彰英、松本信广、大林太良、伊藤清司等都是成果斐然的大家。他们所注目的，是从神话去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等问题。

拿西方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的神话时，日本和西方的一些神话学者，尽管有时候也可以得到解释上的某些方便，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削足适履似的硬塞硬挤，于是在他们的解释中，中国洪水神话里常见的两个小孩因为同情雷公而违背父命引致洪水及父亲死亡的内容，就成了杀父娶母的 Oedipus（恋母情结）；葫芦

和葫芦的种子，也就成了原始的子宫以及“有牙齿的阴户”（*Vagina dentata*），于是洪水神话，只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渴望重回乐园的“子宫回归”。或是如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家 Levi - Strauss，喜欢搜集今日仍然处于未开文明状态的非洲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和习俗，由这些未开的原始神话习俗证明未开社会与文明社会结构原理上有其一贯的同质性，这些理论用在神话的研究和解释上，自然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类学者却忽略了民族和文化上的“异质性”而只见其“同质性”，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自己所形成的“自我文化圈”，像中国和印度，对于人性自很古以来就有了高度的哲学反省与知性的自觉，这种自觉与反省，是不同于其他周边民族的。在周边民族的社会结构还停在原始未开的阶段，中国和印度等古文明民族即已经通过哲学反省与知性自觉而建立了以自己文化为中心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了。比如中国古代，经过殷商与两周的长期经营，到了春秋孔子出现的时候，文化上已经呈现了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而迷信原始社会理论的学者，却根据他的理论而把当时的儒士解释为今日未开民族所见的巫教集团，孔子自然也就成了蛮族呼风唤雨的巫师了。

加藤常贤先生精通古文字学，他的《汉字的起源》（1971）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1981），在今天依然是经典之作。可是经过加藤先生精密的文字学考证以后，孔子所推崇的“仁”和“仁者”、“善人”，成了患了软骨症的佝偻。不但儒家的仁者如此，商汤尹伊、文王武王及周公他们一家，及许多古史上的圣贤，全成了身体残废或四肢不全的畸形人。有的学者用图腾的观念去解释古代中国的民族和神话，使得古代中国成了一个充满了奇禽怪兽的动物园。有的学者用生殖崇拜的宗教仪礼去解释古代中国，使得古代中国成了一个只有男女两个生殖器官的天体杂交的乐